

1898

年：一百零三天，上百道詔書，為什麼只活下來一所大學？

《神州大地》第 11 集 · 語言：中文 · 時長：16:22

出處：sylogs.com — 歡迎轉載分享，請注明出處

一八九八年，北京。

一群書生，想用一道道詔書，

改造一個延續兩百多年的帝國。

他們有年輕皇帝撐腰，有滿紙的理想。

但一百零三天後，一切歸零。

這一集，不講前面發生過什麼，

就講這一百零三天本身：他們做了什麼，

又為什麼輸。

領頭的這個人，叫康有為。

甲午打輸了、台灣割了、白銀兩萬萬兩賠了——

這些我們之前講過，這裡只說一句：

變法不是憑空來的，是被人逼出來的。

康有為考了幾次才中舉，三十六歲才中

進士。他寫的書，學術上頗有爭議。

學者廖平、錢穆指出，他的今文經學有穿鑿

附會之處——喜歡把孔子說成「改制」的先驅，

為變法找理論根。

這是學術界的評價，和他在變法裡的角色，

是兩件事。但有一點沒爭議：

他極會說動人，也極有膽子。

一個屢試不第的人，敢於大膽改寫聖人

經義，本身就是一種魄力。

一八九五年，他連夜寫萬言書，

聯合舉人請求拒和變法，這事後來叫「公車上書」。但要說清：這份萬言書並沒真的遞到光緒手裡，它流傳在士人之間，成了一種姿態。據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核對簽到冊，實際連署只有八十人上下——兩說並存，不取一尊。

一八九八年六月，光緒召見了康有為。

這位皇帝當時二十七歲，在位已經二十四年，大權卻一直在慈禧手裡——

這一點我們之前講過，這裡只帶一句。

召見之後，康有為沒能進軍機處——

滿洲親貴不讓。但他拿到了一個特權：

可以專摺奏事，繞開衙門直接上給皇帝。

一道口子，就這樣打開了。

從此，變法的詔令，可以繞過正常的官僚層層，直接從皇帝筆下出來。

六月十一日，光緒下了一道《明定國是詔》，變法，正式開始了。

從這天起，一百零三天裡，朝廷下了上百道

詔書：廢八股、辦學堂、練新軍、

設農工商總局、准許百姓辦報。

這是中國兩千年來，第一次有人試圖從制度上整套翻新。

但詔書一多，問題也來了。

一道詔書，不等於一份權力。

下面的人，可以不執行、可以拖延、

可以陽奉陰違。當時的地方督撫，

像張之洞、劉坤一，多數採取觀望。

北京的詔書飛出去，地方上靜悄悄。

這一點，當時很多人沒想清楚：

寫在紙上的命令，要有人去扛、

去推，才會變成現實。

可就在召見康有為的前幾天，

慈禧先下了三道諭旨。

第一道，罷免帝師翁同龢；第二道，

二品以上官員任命，須到頤和園向太后

謝恩；第三道，榮祿出任直隸總督，

統北洋兵。這三道，表面是例行安排，

實際上把人事權、兵權，牢牢抓回了慈禧

手裡。變法的命門，從來不在詔書寫得多

漂亮，而在誰能任命誰、誰手裡有兵。

這一步，光緒這邊先輸了一截。

康有為還提了一個更大膽的構想：

設「制度局」，下設十二個專局，

繞開六部，直接替皇帝擬章程、

推新政。這套想法，在康有為看來是效率；

在滿朝文武看來，是要把他們幾百年的

衙門體系整個架空。

六部、軍機、督撫，全成了被繞開的人。

於是反對聲音，不只是守舊，

更是切身利益。後來制度局始終沒設成——

但光是提出來，就已經把整個官僚層都

得罪光了。

一百零三天裡，真正留下來的，

只有一件：京師大學堂。

一八九八年七月三日，章程獲准；

孫家鼐當首任管學大臣，丁韞良做西學總教習。校址在景山東街的和嘉公主府——就是今天北京東城區沙灘后街五十五號一帶。梁啟超擬的章程裡寫著，它是「各省學堂之表率」。

政變之後，別的詔令全廢，唯獨這間學堂被留下來，後來成了北京大學的前身。

今天走進沙灘后街，那片老建築還在，門牌上寫著北京大學紅樓舊址相關的文保標牌——這是戊戌留下來的，唯一活到今天的新政。

要說得罪了誰，得看權力在地裡。

滿洲親貴，是變法第一個不舒服的群體。

廢冗衙、收兵權、旗人自謀生計，刀口都朝著他們的飯碗。

榮祿，是其中的關鍵。

他握著北洋的兵，也深得慈禧信任。

維新派想繞開他，卻繞不開他手裡的槍。

還有頑固的舊臣，如剛毅、徐桐，打心裡看不起這群「狂生」，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這些人，本不一定非要站在對面。

可惜，維新派的作風，沒給他們留台階。

先說裁官。被裁的，不只是衙門，還有衙門裡的人。

一個官被免，背後是全家、門生、

故舊。這些人，本來不一定是敵人。

他們可以是被爭取、被安撫、

被慢慢消化的力量。

歷朝歷代的新政，多半是先安頓舊人，

再推行新法。但維新派選了最快的辦法：

一刀切。還沒想好這些人去哪，

就先讓他們沒了位子。

被裁的官員，轉頭就去了頤和園那邊訴苦。

敵人，就這樣被親手送到了對面。

再說康有為這個人，在朝堂上的樣子。

據翁同龢日記記載，康有為見人時「狂甚」，

說話不留餘地，連翁同龢這樣的帝師，

都被他頂撞過。他不大講策略。

軍機大臣孫家鼐、榮祿這些人，

本是能周旋的對象，卻被他無端結了仇。

據記述，他甚至對光緒說，要「勿去舊衙門，

唯新增差遣」——話是對的，做法卻把人推遠。

一個想幹大事的人，把能幫忙的人都變成

了對面的人。這不是敵人太強，

是自己太急。急到忘了：改革能不能成，

往往不看你想得多對，而看你能團住多少

人。

說到錢。變法要辦學堂、練新軍、

興實業，每一項都燒錢。

當時清廷一年的歲入，學者估算大約在

八千三百萬到八千九百萬兩白銀之間——

地丁稅兩千多萬，鹽課一千多萬，

釐金一千多萬，海關稅一千七百萬到兩千三百萬。（出處：彭雨新《清代財政史》等學者估算）但甲午之後，清朝已經背了一身外債：一八九四到一八九八年，為賠款和借款新舉的外債，累計約三億五千萬兩。

（出處：清代財政史料彙編）

到一八九九年，外債的還本付息，佔了財政收入將近三成。

光緒也試過向民間籌錢：一八九八年發了一億兩的公債，結果只賣出去一百萬兩就停了。信用，也是一種改革的資源。

公債賣不動，說明朝廷向民間借錢的本錢，已經沒了。

變法者不是住在宮裡。

他們大多住在宣武門外的會館區。

康有為住南海會館，在米市胡同；

譚嗣同住瀏陽會館，在北半截胡同；

梁啟超住新會會館，在粉房琉璃街。

幾條胡同之間，走路就到。

議論、寫稿、夜訪，都在這些會館的燈下發生。

附近還有廣和居的飯莊、鶴年堂的藥鋪、

法源寺的院子，是他們吃飯、

抓藥、散心的地方。

今天這些會館大多已不存或改成民居，

北半截胡同的瀏陽會館舊址，

還立著一塊文保標牌，提醒這裡住

過譚嗣同。

維新派手裡有詔書，對面手裡有別的東西——

有兵、有權、有幾十年的積威。

突破口在哪？光緒急了，給康有為、

譚嗣同下了一道密詔，大意是：

形勢危急，你們快想辦法。

譚嗣同想出一個險招：去找袁世凱。

袁世凱這個人我們講過——他在小站練出的

兵，是當時最像樣的一支新軍。

一天夜裡，譚嗣同去見了袁世凱，

請他舉兵，圍頤和園、護皇帝。

這一夜談了什麼，沒人能完全說清。

留下的記載幾種說法對不上：

袁的日記是一種講法，梁啟超的記述又是

另一種。後來流傳最廣的說法是：

袁世凱轉頭就去向榮祿告了密，

引發政變。把這個說法當成定論，

是很多通俗歷史片的做法。

但學界一直有爭議。

考證派如茅海建指出：慈禧和榮祿早就在

佈局，榮祿當時已調聶士成、

董福祥的兵進京，這不是一夜之間才發生

的。即便袁世凱什麼都不做，

那一步棋，很可能也照走。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慈禧訓政，軟禁光緒於瀛台。

變法，一百零三天，結束了。

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

楊銳、劉光第，六人，在菜市口被殺。

譚嗣同本可以走，他沒走。

據梁啟超記述，他為人任俠，

輕財重義，待朋友極慷慨；事敗前有人勸他

走，他留下一句：「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

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

此國之所以不昌也。」

這話不是演說，是他赴死前的心境。

菜市口，是六君子就義的地方。

清代的刑場就在這裡。

今天你若去菜市口，只會看到一個地鐵站、

一片商圈，和「鶴年堂」老字號的招牌——

當年的刑場痕跡早已無存，

連那座見證過無數斬決的牌樓也拆了。

康有為、梁啟超逃了，一個去了日本，

一個輾轉海外。康有為在華僑中以「營救

光緒」為名募款，聲勢很大。

但據馮自由《革命逸史》等記載，

這些巨款有不少用在了他個人居行

與開銷上，生活相當闊綽——一個人流亡在外，

住好宅、出行有排場，和「救主」的初衷是一個

刺眼的對比。同時也要說，他在海外也持

續辦報、維繫保皇會，把變法的主張傳到

更多人那裡。回到一開始的問題：

這場變法，為什麼敗。

答案不在「敵人太強」這四個字裡。

在於：想法是對的，路是急的；

詔書是多的，人是不穩的；朋友是有的，

卻被自己推成了敵人。

今天看任何一場變革，這條規律沒變：

先數一數，誰是我們的人，誰被我們推去了

對面。槍在誰手裡、錢在誰手裡、

人事在誰手裡——這三樣，比一百道詔書，

都實在。

Source / 出處: sylogs.com